

浅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 政治心理变迁历程^{*}

文红玉 金 倩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根据建设初期发展的需求,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共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及举措,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风细雨、耐心细致、循序渐进地调整策略,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有了重大的改观,心甘情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民族资产阶级 心理变迁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4)06-0176-07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中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的资产阶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本国封建主义解体中发展起来的”^①。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19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②。

中共中央在1981年将1949—1956年的中国历史界定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③。在此阶段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换;而后,伴随着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事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④。在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被视为被消灭的阶级,在多变的政策之中,他们的心理变化最为复杂。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民族资产阶级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积极投身于这一进程中,有的还推动了这一进程,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这一进程速度之快让人匪夷所思。其实,分析这一进程,政治心理是决定政治行为的关键。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应,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构成人们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⑤它

极大地影响着人们政治参与的形态、以及广度和深度。^⑥政治心理影响和引导着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反过来也影响着政治心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徘徊与顾虑心态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领导力量的前提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⑦。这段讲话后来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进而提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⑧在召开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在规划新中国的蓝图时,十分精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体现在全会决议的以下部分内容中“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剥削,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

^{*}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4BDJ013)的阶段性成果。

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⑩这份决议提出了资本主义在刚成立的新中国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即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由此看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是鼓励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关于自身命运的选择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跟着蒋介石和国民党逃到台湾;第二种是选择移居到香港或是国外,这部分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心存恐惧和怀疑;第三种是相信共产党并且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大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前两者相比,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民族资产阶级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和自身命运的转变历程。

选择留下来按照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内心是徘徊不定的。一直以来,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中国共产党都是温和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清楚地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⑪,因此在心理上是既惧怕又顾虑:怕的是共产党终究会进行清算,顾虑的是跟着共产党企业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刘鸿生就曾说过“我那时不但不能相信共产党,而且怕他,怕共产党来了要清算我。”荣氏家族的荣毅仁说得更为形象“又听得谣言四起,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要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在外表还要故作镇静,免得厂里一些同事惶惶不安,内心却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⑫“荣毅仁的这番话大致说出了他当时的心情。不过,同其父亲一样,有一条他是不变: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好;共产党再怎么样,绝不致于比国民党更糟吧。”^⑬刘鸿生出生于上海,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曾被誉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及“企业大王”。荣毅仁在1957年曾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他们二人的观点具有极强的代表性。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内心是忐忑不安和十分惧怕的,他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消灭资产阶级,也害怕自己的财产被清算,怕被中国共产党当成剥削阶级来对待。武汉的民族资本家徐雪轩道出了自己的疑

虑“一是我的商店还能不能经营;二是我个人有没有出路;三是我的子女有没有前途。”^⑭这是当时民族资本家最普遍的心态。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允许并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心理上的忐忑游移,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下的兴奋和信任心态

新中国成立初,人民政府没收、改造2800多家官僚资本企业,征用、代管、征购美国和其他一些外国在华投资企业,再加上原有“解放区”的公营企业,在短时间内,国营经济力量迅速壮大,掌握了社会生产力最先进、最强大的部分,基本控制了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与此同时,新的中国政府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对工商业进行了两次较大范围的调整,鼓励和扶持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使其充分发挥繁荣经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大力扶植,私营工商业逐渐出现转机,并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国家从各个方面对私营工商业给予照顾和支持,例如经营范围、原料供应、产品销售、价格政策、税收方面,通过这些措施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对一些工业品的大量需求,土改完成后农民购买力的增加,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展开,使得经济环境大为改变,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局面。1949—1952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从相对数字来说虽低于同期国营经济,但绝对数字却有很大增长。私营工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54%。特别是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11.9%,从业人员增加了11.8%,批发额增加了35.9%,零售额增加了36.6%,职工人数增加了11.4%。^⑮1951年,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在22年间从未有过的高额利润,这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曾出现的。

随着对旧中国经济结构的变革,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到1952年底,中国形成典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例:1949—1952年,全民所有制经济由26.2%上升到41.5%,公私合营经济由2.2%上升到13.7%,集体经济由0.5%上升到3.3%,私营经济则由48.7%下降到了30.6%,个

体经济由 23.0% 下降到 20.6%。^⑩这种经济结构适应了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们的政治心理是对一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反映,都是与人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的。”^⑪也正因如此,资产阶级慢慢恢复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前途有了信心。

实际上,这种信心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月里,通过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等一系列措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逐步转变为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带来一定的阵痛。1950年3月,中央采取制止通货膨胀的有力措施之后,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这正是社会经济结构新旧转换的反映。许多城市工厂开工不足,市场萧条,影响到社会人心的安定,民族资产阶级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武汉有资本家写了一副对联“挂红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⑫,反映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心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稳定市场物价后,民族工商业出现萧条,也使得民族资本家心神不定,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怀疑自己的企业能否继续生存,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出现了工厂减产、产品滞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现象。因此,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来保存自己所积累下来的财富,有的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关闭企业,解散职工;还有的弃厂出走,跑到海外去。“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⑬更有的要把工厂“献”给国家,刘鸿生就曾经给陈毅市长写信说要把企业献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是难以维持下去了。“湘鄂赣和武汉市的工商业者说,你们的贸易公司、合作社一起挤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前途!”^⑭

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忐忑不安和疑惧心理,中财委认为,由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重改组,长期在旧社会金融混乱、投机盛行的环境里求生存的私人经济发生困难是难以避免的。但正如陈云所分析的“这是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过程中的痛苦和苦难。整个地说来,它是带暂时性的。”^⑮中共和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要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⑯由于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得当,这样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产生了信任感,其心态也从徘徊忐忑变成了兴奋。当时上海的资本家盛丕华曾说:“这下,我们都是股东,共产党是经理了。这个经理是可以相信的,他们没有吃过败仗,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投票赞成。”^⑰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民族资本家在心理上是相当兴奋的。尤其是在出现了1951年的大发展,加之抗美援朝期间急需大量工业必需品,民族资产阶级通过供货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后,心理上更加兴奋起来,认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好的发展空间。

对工商业由萧条到复苏的过程,陈云有个形象的描述“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⑱武汉的资本家也把原来对现状不满的对联改为“挂红旗五心已定,扭秧歌稳步前进。”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形势更加好转。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增长39%,私营商业(包括纯商业和饮食业的坐商、行商、摊贩)销售额增长38.7%。资本家对调整工商业政策带来的市场兴旺和丰厚利润感到振奋。上海资本家称1951年是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年”。^⑲

换言之,因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大力扶持带来企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这一时期该阶层的心态是普遍的兴奋和信任。

三、开展“五反”运动期间从恐慌到服从的心态

恐慌和服从是“五反”运动前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指出“两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正确性。现在是切实执行这一方针的时候了,否则就会犯大错误。”^⑳于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各人民团体中迅速展开“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开展“三反”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不法资本家中存在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现象。鉴于这种严重情况,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斗争的同时,在工商业界开展一场“五反”运动。

从运动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涉及面很广。据国家税务局1950年在缴纳第一期营业税后的典型调查资料显示:上海市在3510家纳税户中,有逃税行为的占99%;天津市1807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82%。偷税的税额也相当巨大,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甚至高达80%。^②又据北京市1952年的调查显示,约有13087户、占总数26%的工商户有不同程度的行贿行为。一些不法资本家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订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特别是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里,竟有不法资本家制造和贩卖的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造成一些战士用后致病、致残甚至死亡。这不能不激起广大人民的义愤。“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一时成为全国上下的强烈呼声。^③

于是,从1952年2月开始,党和政府开展了“五反”运动。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的第一次大的冲击。在“五反”运动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普遍倍感恐慌,其主要原因:一是担心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认为“五反要消灭资产阶级”,“政府不要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地主隔壁”。这些可以当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疑惧心理的再现。在民族资产阶级脑海深处,即使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们曾有过支持共产党的正义之举,但仍不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要消灭的对象,所以政策一旦有风吹草动,这种恐惧怀疑的念头就会卷土重来。二是担忧经济状况的改变。认为“三反五反还不是政府要钱”,“商人迟完早完总是完”,“今后生意不好做了,赚了钱就是五毒嫌疑,要来二次五反”。^④如刘鸿生因全部企业在“五反”时均受到检查,心中甚为不快。他告诉他的儿子“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这个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他担心,自己早晚要被清算掉的。^⑤

客观来看,“五反”运动在揭露资本家不法行为的斗争发动起来后,不可避免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冲击。据天津市工商局统计,1952年1月至9月,工业方面开业366户,歇业1102户;商业方面开业1085户,歇业4353户。^⑥1952年全年,全国大中城市私营工商业歇业数超出开业数11791户。私营工商业因运动期间生产停顿、市场呆滞造成营业亏损,加工订货和银行信贷减少,还要退补违法所得,资本家普遍感到不安,对今后如何经营感到无所适从。

当然,中国共产党进行“五反”斗争并不是要

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五反”运动的后期进行了比较宽松的处理。1952年“五反”以后,一些资本家消极经营,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十分紧张。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一个小组,于1953年3—4月间到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开展调查研究,并于1953年5月27日向中央递交了《资本主义工业中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公私合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⑦经过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有所发展。1952年,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比1951年增长5%,1953年则比1952年增长20.5%。^⑧在“五反”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共同纲领》轨道上继续发挥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也因为此,在经过稳定物价和“五反”的较量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以及在经济上进行对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开始从内心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经过惊心动魄的“五反”运动的考验,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了空前大发展,工商界人士把它称为“难忘的一九五三年”。民族资产阶级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了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对新民主主义怀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以致有人提出“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⑨!荣毅仁在解放初期说“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后来随着认识的提高,在另一场合他又说“举一只手赞成共产党是我错了,现在要举双手拥护共产党”^⑩。“五反”运动后,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拥护和支持的态度,在心理上是真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赢得了被改善生活条件和提高国家荣誉的诺言所吸引的人民的真心支持。”^⑪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的矛盾与无奈的心态

矛盾与无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心理。1953年,中国开始了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年,党正式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把这条总路线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针。“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③在确立指导思想和改造政策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依据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逐步过渡与“和平赎买”的改造方针,即首先把资本主义带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然后再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此时,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向,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重心也转移到了如何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④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心态上的准备是模棱两可的。说有准备,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一定要消灭私有制有着清醒的认识;说没有准备,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如此快地消灭私有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自身历史命运的安排只能被动接受,正如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⑤。同时,毛泽东也理性地认识到“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⑥“人的心理因素是通过其政治行为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⑦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也呈现出不同的心态。大致归纳如下:

第一部分人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他们看清了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主动提出改造,愿意向国营经济靠拢。武汉的陈经畬认为“过去总认为自己的资本是克勤克俭挣来的,解放后才弄懂是剥削来的。这笔钱拿在手上,真是如坐针毡。早一天交出,早一天安心。”^⑧当然,这部分人也持有复杂的心理,充满痛苦和矛盾,有人形容他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⑨。1955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荣毅仁先生时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屣,没有一点痛苦,

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⑩

第二部分人是无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他们舍不得自己的企业,但又无法改变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流,所以只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他们感到“船到江中,无可奈何”,只得拥护。^⑪他们已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是死路一条”,说“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潮流,水要往东流你非往西走,早晚淹死”,“谁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谁就玩不转”。他们认识到只有积极经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个人才有前途,“这次才明白社会主义改造光躺下等着不行”,“消极经营没有好处”,“今天有贡献将来不会亏待”,“毛驴下磨,不会不给吃喝”,“今天好好干,将来有个安身”。^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政治上的得失实际上重于单纯利益的得失。出于自我防御的心理需要,私营工商业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心里的心理冲突掩盖起来。表面上资产阶级对总路线热烈拥护,一片欢呼之声,背地里却是牢骚满腹,流露出极大的不满情绪。如有的资本家就说到:“工厂被赎买,以后至少是个工人,如果与政府作对,也许就没有以后了。”他们认为“过去是利用阶段,现在是限制阶段,今后是改造阶段。”有的说“利用我们的钱,限制我们不拿钱,改造我们不做生意。”有的说“税收加总路线——两个完蛋。”有的把过渡时期总路线诬蔑为“过刀时期总路线”。有人说“不跟着总路线走就是犯法,只有附合潮流,拖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⑬在这些想法的促使下,一些怀有抵触情绪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心理是悲观的。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上了贼船”,“船在河中,只好认头”。有的资本家问“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他们认为,“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们形容“代购、代销是进去了一点”,“加工、订货是进去了一半”,“‘公私合营’就全进去了”。说公私合营是“借地插秧”,目的在于把资产阶级全部“溶解掉”。^⑭他们有的写“祭厂文”,有的写诗,说“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⑮,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火、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方式来抗拒社会主义改造。^⑯

第三部分是顽固分子,严重抵触社会主义改造,采用各种手段破坏和抗拒改造,其手段主要有大规模、有计划地抽逃资金,挑拨工人和政府的关系,阻挠别的资本家接受改造等。除此之外,有的拒绝加工订货,声言“国家的计划很重要,我们的计划也很重要,国家的计划不能打破我们的计

划。”有的企图逃往国外,说“我受不了这个罪,想什么办法也要逃到国外去。”有的视改造为折磨,说“想什么办法也得到国外去”,还有的甚至秘密集会或结党进行密谋活动。^{⑤1}个别人对改造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情绪,如北京仁立麻纺织厂出现了“新仇旧恨一起来”的标语,还有人说要“拿青天白日旗欢迎公股”等。^{⑤2}

到了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国家开始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又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面对改造中的具体问题,还要考虑改造后出现的问题。这一时期,一些大的资本家担心的是待遇和利益问题,他们对公私合营后自己的职务和相关人事安排非常关心,同时也关心定息几厘、几年取消,更担心收入减少,影响生活。中小资本家则担心合营后以往的困难还是解决不了,说“社会主义好是好,但我们是玻璃柜里的苍蝇,看见前途,找不到出路”^{⑤3}。出现了“有前途(指社会主义前途光明)、无中途(指当前实际困难)”的说法,所以争安排、争待遇;小生产者出身的资本家,要求摘帽子,改变成份,归队当劳动人民;资本家的代理人,要求明确阶级成份,当“公家人”;青年资本家认识到自己“三分之二的日月在社会主义里,积极主动争取早日改造成劳动者”。^{⑤4}为了动员工商业者积极地参加到改造的高潮中来,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学习和讨论,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以在旧社会的经历说明资本主义道路是“大鱼吃小鱼”,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的《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⑤5}

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有着不同程度的波动,但总体说来还是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由于过去几年来,多数私营工商业者从国家政策的扶植中得到收益,也经受了反对惟利是图行为的守法经营的教育,对党和政府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基本上是配合的,这是积极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最终消灭资本家所有制,许多工商业者内心深处又是很矛盾的,多数中小资本家的态度是“随大流”。总之,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是在复杂的心态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但他们大都看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势所趋。^{⑤6}

薄一波在总结这点时曾说“1955年冬天,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的滚滚人流中,虽然心情复

杂,难以一概而论,但是希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却是许多人的共识,这是抹煞不了的。”“在中国当时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民心所向。”^{⑤7}由此看来,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是愿意接受改造并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他们的心态也开始转变,从矛盾和无奈中解脱出来,开始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深深体会到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关怀和政策的正确性,认识到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首先必须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社会主义革命是‘理有固势,势在必至’的道路,认识社会主义改革是大势所趋,是一股巨大的潮流,是不可阻挡和不能抗拒的。因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前途密切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⑤8}荣毅仁在回答作为资本家为什么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荣毅仁历述他作为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如何一直梦想兴办工业,救国图强,可是在旧社会受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于政府贷款、委托加工和收购产品,才使企业摆脱窘迫局面,盈利逐年增加。他说“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能有今天?”^{⑤9}时任宜昌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原联华绸布号经理项克涛深有感触地说“作为近代中国最末一代的资本家,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甘愿交出资产,向自己的反面奔,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理解的……这归根到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者坚持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统战方针和政策,使私营企业和个人有了归宿,各得其所。这样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巨大工程,仅用了7年时间完成,可谓历史奇迹。”^{⑥0}

应该说,新中国初期,中国成功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以新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陈云在1956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评价说“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⑥1}

五、结语

总的说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1979年6月15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说“我国资

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⑫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国情提出了适宜的政策,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各种表现,和风细雨、耐心细致、循序渐进地调整策略,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有了重大的改观,心甘情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探索期,直到完成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在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内心世界经历了痛苦、无奈、挣扎与新生的复杂变化,民族资产阶级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转变使他们意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才能,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创造财富,也是为新社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才积极投身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注释:

①《辞海》(下)中国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3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8页。

④王智《当代中国政治结构变迁——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政党—政府—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

⑤⑥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309页,第322—32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页。

⑪杨友《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自述》,载于《新观察》1956年第21期。

⑫《荣毅仁1959年4月25日在全国人代会二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参见1959年5月2日《人民日报》。

⑬⑭计泓赓《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第151页。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第436页,第147页,第333页,第437页。

⑮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4页,第230—231页。

⑰参见董辅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⑱⑲刘松阳《政治心理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第14页。

⑳《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参见1950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第101页,第98—99页,第429页,第429—430页,第442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第128页,第309—310页。

㉑何晓鲁、铁竹伟《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第160页,第163页,第193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凯歌行进(1953—1956)》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第19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浙江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1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第98页,第198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7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第495页,第502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第198页,第258页,第185页,第268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页,第504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告全国工商界书》,参见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参见1956年1月21日《新华社新闻稿》。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文丁]